



尹吉甫家庙位于房县尹吉甫镇宝堂寺。



房县是中国诗祖尹吉甫故里。

十堰成语故事③

“附庸风雅”与房县诗经文化

■文、图/记者 朱江

小国以依附庸国为荣

附庸风雅是一个汉语成语。然而,在古代“附庸”和“风雅”是毫无关联的两个词。其中,附庸,原指依附大国的小国,有依附之意;风雅,泛指诗歌,指诗经中的国风与大、小雅,也用来代指《诗经》,泛指诗文书事。

如今,附庸风雅是指缺乏文化素养的人为了装点门面而结交名士,从事有关文化的活动。

鲜为人知的是,这个成语来源历史悠久,前后两字记人记事,与古老的十堰息息相关。

十堰地域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。夏商周三代有房、庸、彭、微、麇、绞、均、郢等古方国先后在十堰境内建国。

春秋时期,建都上庸(位于今天竹山县西南区域)的庸国,是楚、秦、巴三国间较大的国家。公元前611年,庸国被这三个国家所灭。

庸国所处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,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,同是中华文化的摇篮。按照周代的礼制,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,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,小者仅五十里,不满五十里更小的封地要依附于诸侯国,而古庸国,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地域辽阔的大国。

古庸国盛极一时,当时疆土比早期的周宗姬封侯国还大,包括麇、鱼、夔、僚等附属小国,其东部含古麇属地,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、桑植等县,今巴东、兴山、秭归、建始等县,是古代夔国的领地,当然也是庸国所属。

不仅地盘大,庸国还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文明古国,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,其占领峡江地区后,拥有了峡江盐泉,并成为盐业大国,同时还是制陶大国、筑城大国、铸造大国等。先秦许多文化之谜都与庸国紧密相连,庸文明几乎包括了全部的古文明元素。庸人更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。在古代,西方最为典型的民族是希腊的斯巴达人,而东方则是中国的庸人。

《古代战事考》记载的“惟庸人善战,秦楚不敌也”,这些善战的庸人主要指的就是土著先民夷人。因此强大的军事技术,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,众多的方国以纷纷依附庸国为荣,是为“附庸”。

据《尚书》介绍,庸国曾率卢、彭、濮等南方八国军队协助周武王伐纣。灭商之后,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,以军事实力奠定了老子所说的泱泱大国地位。

“风雅”代指《诗经》也泛指文化

今天,我们使用“附庸风雅”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,但是在古代,“附庸”和“风雅”却是两回事,而且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,不存在要追随的关系。

“附庸”是指小国以依附庸国为荣,那么“风雅”又为何泛指文化呢?

原来,“风”和“雅”是《诗经》的两个组成部分。《诗经》由三部分组成,即风、雅、颂。“风”是各诸侯国的民歌,称作十五国风,共160篇;“雅”又分大雅、小雅,是周王室“邦畿”之内的音乐,被尊崇为正声,共105篇;“颂”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,共40篇。因此,“风雅颂”或者“风雅”就用来代指《诗经》,“风雅”因此也用来泛指文化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,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篇

诗歌。《诗经》的作者成分很复杂,产生的地域也很广,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?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。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尹吉甫采集、孔子编订。

近代学者朱自清认为,《诗经》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尹吉甫之手。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和整理《诗经》的功臣,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,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。现存的《诗经》,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,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。古代交通不便,语言互异,各时代、各地区的歌谣,若经过周王室的乐官——太师加工整理,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。可以说由官方制作乐歌,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,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,在《诗经》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。

房县被授予“中国诗经文化之乡”

尹吉甫是房县人,为距今约2800年前周宣王的重要辅臣,是历史上著名政治家、哲学家、军事家。由于尹吉甫担任的官职是内史。西周时内史又称“内史尹”或“作册尹”,简称“尹”,所以“尹”是官名。

作为《诗经》的主要采集者,尹吉甫被后世尊称为“中华诗祖”。尹吉甫晚年被流放回房县,死后葬于青峰山。至今,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。

从1980年开始,十堰地方文化学者袁正洪就在收集研究《诗经》和尹吉甫文化,多次深入各地考察、拜访专家、查阅古文献。他研究认为,西周太师尹吉甫,即令伯吉父仕于西周,征战于山西平遥、河北沧州南皮县,其子尹伯奇故事传说于四川泸州。尹吉甫故里是湖北房县,食邑房,卒葬于房县。

袁正洪的研究受到博士生导师、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的充分肯定,题词房县是“尹吉甫故里”。

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

诗经在房县传唱。《诗经》的重要作者就是房县的尹吉甫,房县也是《诗经》的发源地之一。房县有关部门在民间文化抢救挖掘整理中,寻找《诗经》中的房县,在房县古老的民歌中找寻《诗经》相关民歌。现在,已发现20多首与《诗经》相关民歌,在房县一些乡村仍在传唱。

然而,“附庸”和“风雅”从何时开始连用,已不得而知。

目前所知最早在明末清初,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就曾使用过这个成语。明朝文学家和书画家陈继儒号称在小昆山隐居,却又周旋于高官显贵之间,为时人所诟病,钱谦益谈到陈继儒的这一行径时,八字评语,含有微讥之意,讽刺说这叫“装点山林,附庸风雅”。

点山林,附庸风雅”。

清朝乾隆年间的戏曲家、文学家蒋士铨所作传奇《临川梦》有《隐奸》一出,描写陈继儒上场的开场诗就化用并扩充了钱谦益的评语:“妆点山林大架子,附庸风雅小名家。终南捷径无心走,处士虚声尽力夸。獭祭诗书充著作,蝇营钟鼎润烟霞。翩然一只云间鹤,飞去飞来宰相衙。”从此之后,“附庸风雅”成为贬义词,用来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,比如常常称那些暴发户购买书画的行为是“附庸风雅”。

可见,文化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,人人都要显得“有文化”。如果明明没有文化,偏要装得有文化,这就叫“附庸风雅”。